

從展望理論看選舉決策

洪茂蔚 劉玉珍 戴維苾

壹、前言

舉凡引起國際矚目的統獨公投，飛彈公投，至影響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甚鉅的五千億的建設計畫，甚至小至提出里長應為有給職的補貼措施，所有國家長遠發展受到政策規劃與推動的影響，而政策的制訂又受到當前主事者及其執政團隊的想法所主導。

決策者個人效用往往會影響國家長遠的發展目標。因此，在看待各個政黨所開出政見遠景的同時，應該審慎分析所有影響決策制訂者效用的相關因素，如此才能做出正確與理性的判斷，為國家的發展發揮最關鍵的影響力。

本文期望透過展望理論，對於各項政策議題判斷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角度。整篇文章將會分成三個部份，以探討展望理論在選舉上的應用，第一節探討如何以展望理論預測選舉的結果與發展，第二節探討展望理論在選舉互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然後我們以實驗例子來進一步說明分析如何展望理論在政策制訂與選戰文宣策略上。最後一節則是結論。

貳、展望理論

「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是特夫斯基 (Tversky) 與卡尼曼 (Kahnman) 於 1979 年對主宰經濟學界數十年的「期望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 所提出的反省。他們指出：(1) 人在不確定情況下的決策行為其實是相對的概念。(2) 有時候個人會喜歡追逐風險，有時則會迴避風險。(3) 一般人不喜

歡風險。

簡單而言，展望理論有以下三個重點：

1. 人對利得和損失的偏好剛好相反；在面對損失時，有風險愛好的傾向，對於利得則有風險趨避的傾向。例如：假設有兩個選擇：一是確定損失 880 元，二是輸掉 1000 元的機會為 90%。心理實驗發現大部分人願意冒險賭注，選擇第二個方案者較多。

2. 人們對於損失與利得感受的判斷是一種相對的概念，重要的是相對於某個參考點的財富變動，而不是最終財富的預期效用。當收入增加時，一般人會渴望得到更高的收入，於是不滿足感與日俱增，這種現象也常會因為個人對問題描述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

3. 一般人不喜歡風險，因此會較偏好結果確定的選擇。例如：如果有兩個賭局：一是有 90% 的機會得到 1000 元，10% 的機會得到 200 元；二是確定得到 910 元。實驗發現大部分的人寧願選擇賭局二。

總之，展望理論跟期望效用理論最大的差別在於以主觀價值來取代期望效用。主觀價值考量了人們對於獲利與損失在態度上的差異。此外，在加權時也不是直接以發生機率進行加權，而是以經過心理調整後的機率函數來加權。

參、從展望理論看選舉

展望理論在經濟，教育，國際關係，行銷，公共政策與選舉政治方面多有持續的探討。例如，Kepke (1997) 曾利用展望理論探討當年伊拉克與美國的敵我心結，Parekh (1995) 以展



伍、管理專題



望理論探討美國與北韓的緊張關係，De Bondt and Makhija (1988) 以展望理論探討核能電廠投資案的中途放棄的問題。

將展望理論的觀念應用在選民與決策者的思考邏輯上，可以提供我們以下啓示：

1. 經濟前景佳時，人們會爲了維持現狀，通常選擇較保守的執政者或政策，反之當景氣不振或面臨重大威脅時，人們反而易孤注一擲，而接受大膽或激進的政策與候選人。

將展望理論「利得與損失風險偏好相反」的觀點加以延伸。由於人民有安於現狀的執著，一旦經濟前景美好時，大動作的政策變革，往往不爲人們所樂見，當人們的生活面對威脅時，例如面對面臨景氣衰退、失業危機時，任何願意改善現狀的政策，人們都願意嘗試。換句話說，當選民認爲當前國家穩定、經濟蓬勃發展時，較會傾向支持在位的執政者。反之，當選民對於當前國家發展與經濟環境有許多不滿時，則易冒險投票給較具創新觀念、激進批判、或者不同于現任在位者聲音的候選人，即使該候選人的經驗與執政效果如何尚且未知。

2. 人們的感受與判斷受到決策參考點的影響。瞭解什麼是選民最關心的議題？不同的議題，選民可能採用的決策參考點爲何是相當重要的，因爲如此一來，才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也才能以最佳的方式規劃與行銷自己的政策，進而使所提的政策與政見獲得選民的認同。

根據展望理論，人們的獲利與損失受到相對參考基準點的影響，選民心中的參考基準點可能是其他國的經濟與政治環境，也可能是國內在選舉之前的狀態（通膨率或失業率的情況）。當選民心中認知的參考點有差異時，會影響選民對於政治與經濟方案的評估，而有不同的偏好。

3. 透過問題與政策描述方法的不同，可以扭轉選民心中判斷優劣的決策基準點，而改變

選民心中的看法與支持度，進而扭轉選情。

描述問題與政策表達的方式會影響選民心中的決策參考點，進而影響選民心中對於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與相對優缺點的評價，與執政者與候選人在選民心中的看法。例如政策推動時，預期效果的表達，如果以金額或百分比表達的話，對選民心中的感受會不同，而刺激不同的偏好。同樣地，不只是政策宣導，選戰文宣，適當的選擇有效的表達方法，都可以使政策或政見爲執政者或反對黨提供借力使力的工具。

4. 相較於獲利，人們對於損失的反應較爲敏感。

國泰民安時，如果不同候選人皆提出某些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對選民來說，因爲敏感程度較低，感覺差異較小，影響力較小，因爲選民並不覺得需要積極去投票作改變。相對地，當選民覺得當前國家經濟前景不佳時，則會有急欲改變當前環境的動機，較會積極地去投票。

個案一：美國期中選舉

展望理論的第一個應用是，人們將選舉視爲避免未來損失的手段。展望理論所提的第一個重點—處在滿意狀態下，老百姓會採取風險趨避的策略；處於損失或受威脅的情況下，則會有損失趨避，反而甘冒風險的行動。美國有所謂的期中選舉制度，在每四年的總統大選中間，也就是總統大選完二年後，進行參眾議員的選舉。有趣的是，自 1862 年起，美國的期中選舉，除了兩任期中選舉外，執政黨在美國眾議院幾乎都會失去席位。如果說期中選舉提供給選民一個傳遞認同或不認同國家管理當局的机会，則將展望理論用來解釋美國期中選舉的現象，可推論選民認知到他們將面對可能的損失，因此有動機要避免可能的損失而去參與期

中選舉的投票。

Patty (2002) 應用展望理論說明：當經濟狀況良好時(如 1998 年)，很少選民會將目前政府在位者的持續就任視為可能發生損失，因此會選擇風險趨避的策略，也就是繼續支持現任者。反之當總統選舉與期中選舉之間發生強烈負面的衝擊時，則會了避免損失 (Loss Averse)，選民可能會認為若現任政府的政策持續或繼續連任，未來可能有損失發生。爲了要扭轉損失，因此會在期中選舉中積極參與投票，投給非執政的政黨候選人，即使該執政效果可能是不確定、候選人較不知名，因此可以說是一種高風險的選擇。

這個現象主要是因爲選民很自然地會將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歸咎於總統及其所屬幕僚團隊的政績，由於執政者具有高知名度與高曝光率的群擺效果 (類似 Tversky and Kahnman (1973) 所定義的 available heuristic)，使得選民連帶地將責任與能力類推到執政者所屬的政黨與政黨成員身上。因而在期中選舉中，若選民面臨經濟困境時，就很容易對總統所屬的政黨成員投反對票，而導致總統所屬政黨的不論在席位或得票數都大幅減少。

相對地，如果選民對於當前環境與發展是滿意的，且相信執政當局持續的政策推動是好的，則選民並不會爲了要維持現狀，而特別去參與期中選舉的投票，因此，執政黨並不會因此提高席位或有得票數的增加。相較於爲了扭轉現狀與反對執政黨而積極去投票，因此平均而言，使得執政黨在期中選舉的席位或得票數因此是減少的。

與總統所屬同一政黨的其他在位的衆議員，若在其行政區域上已服務很久者，因爲個人的聲望的能力能夠較明顯地與總統特質區分時，將較不會受到總統執政效果好壞的群擺效應所影響。相較於服務時間較短者，知名度較

低的候選人，資深的衆議員在期中選舉時較不會因此失去席位。

個案二：拉丁美洲經濟重建政策

展望理論除了用來解釋與預測選舉的結果與發展外，另外一個重點是提醒決策者在制訂決策時，除了考量個人所處的環境之外，還必須考慮對手(其他參選人)與選民會依據其所處環境，所產生的判斷與認知。特別是選舉與政治決策，當對手擁有相當決策能力時，互動性的策略思考就顯得特別重要，往往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高票落選的情況。

199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hn Nash 是最早倡導決策規劃要考慮對手(回應者)的行動，才能使均衡點落在最佳的決策點上。考慮對手會如何回應的同時，除了理性的分析判斷外，還要考量對手對所處環境以及心理上會產生的認知與反應。同理，執政者或候選人在制定政策與選戰主軸時，也要考量選民對於不同議題的認知與回應，會與其所處的環境與心理反應有關，如此才能使政策推動與選舉政見發揮有效的訊息效果(Signal Effect)。

Weyland (1996) 對於拉丁美洲各國經濟重建成敗的探討中，提出清楚的例證。

對一般人來說，經濟收入是主要的考量。當重要的經濟指標瀕臨威脅時，例如，像是面臨失控的通貨膨脹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他會迫使很多人突然地陷入損失的狀態。

失控的通貨膨脹將人們帶到一個損失的狀態下，突然快速的惡化，常會使人們來不及降低期望與快速地重新調整評估獲利和損失之參考基準點，而易使得人民認為高風險(risk-seeking)的經濟調整策略是有效的。相對地，假如通貨膨脹在溫和狀態，且收入成長在可控制與預期的範圍下，人們傾向於將自己視為處在獲利的情況下，因此將會採取風險趨



避—偏好小心謹慎的策略。

對執政者來說，除了通貨膨脹，還必須關心對外貿易的不平衡、惡化財政赤字等，因為這些都會影響政府長遠的運作能力。總統可能在這些問題公開受到重視前，就已接觸內部資料，規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但此時可能是人民還沒有察覺與感受到此問題的嚴重性之前。

1989 至 1990 年，過半數的阿根廷人、秘魯人以及巴西人處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失控的情況下。阿根廷在 1989 年 6 月通膨率達到 114.5%，巴西在 1990 年 2 月達到 81.3%，秘魯在 1990 年 7 月達到 63.2%，而在同年的這幾個月月底也分別達到 1470%、6238% 和 3014%，同時間也因為稅收相對於 GDP 的減少，而浮現驚人地財政赤字。雖然這些並不是新產生的問題，然而許多試圖解決的方案最後都失敗了，而且還使得金融風暴更加劇烈。

談到對此金融風暴主觀的認知，通常過半數的人民（秘魯高達 77%）會認為經濟的惡化要歸咎於通貨膨脹。未來將進一步惡化的預期在人民間普遍地流傳著。這個絕望的狀態，導致許多選民在 1989 年及 1990 年的總統大選中做了很大的賭注—支持原本非政治圈內但卻承諾可以救國家的人。當時，Alberto Fukimori（智利總統當選者）在當時的政治勢力或社會群體中完全是沒沒無名的人。同時，Fernando Collor（巴西總統當選者）在巴西國家的中堅份子中完全是個邊緣人物，且和主要政黨也沒有隸屬或聯盟的關係。即使是 Carlos Menem—屬於阿根廷二個主要政黨成員其中之一，但在總統選舉中面對有政黨領導人的競爭。特別是，Fujimori 和 Collor 並沒有政治經驗與實力，但當時這三位候選人承諾救經濟的能力卻一點都未被懷疑過。換句話說，他們可說都是高風險的選擇對象。

另一個保守的方案是投給已建立的反對

黨，像是阿根廷的“Renewal Peronists”、巴西的“Partido da Social Democracia Brasileira (PSDB)”、秘魯的溫和左翼 Alfonso Barrantes。這些較成熟的反對黨的政策也許並沒有承諾會有奇蹟發生，但這些力量確實提供了新的想法和重建計畫，不只是要打贏選戰而已，而且也有歷史紀錄證明他們是認真的，有指揮專家與組織的能力，由他們來抑制金融風暴的可能性較高。但大多數的選民往往脫離了深謀遠慮的評估，反而將選票投給那些聲稱可以將國家脫離困境，而未經過檢驗的救世主。

如所預期的，這些新任總統採取了高風險 (risk-seeking) 的方式來應付經濟風暴：主張回歸低度發展，強制施行激烈的計畫，出奇採用大膽的市場導向重建計畫，這些政策的推動伴隨著進口替代產業已發展模式的中斷。此外，要執行此廣泛的重建進一步的困難在於缺乏組織運作與獲得政黨命令的推動。Collor 和 Fujimori 在缺乏堅實、有組織的背景下當選，缺乏可信賴的管理幹部、適任的專家，以致於重建計畫在執行時產生大量的問題。

另外的風險來自於其他重要社會團體的反應。許多手段，像是公債的延期償付、縮減預算的威脅等會招致特殊利益群體的壓力。他們的抵抗會破壞這些經濟計畫，甚至使新總統的政治生命瀕臨危險。因此，激進的市場導向重建其實也是高風險的。

就像展望理論所預測的，阿根廷、秘魯、巴西新的領導人基於了解國家處於損失的狀態，人民對於處於損失狀態的感受相當強烈。新的領導人了解人民對於改變現狀的強烈企圖，因而採取了高度風險的改革策略，即使他們知道採用的新改革的衝擊，成功的機會是如此的不確定，且很容易造成強烈的反對，但他們仍然孤注一擲，並因此贏得選舉。

但同期間，並非所有南美洲國家的改革策

略都可以獲得選民的認同，委內瑞拉的執政者就在改革之路上以政變下台收場。

雖然 1980 年代南美洲國家面臨了逐漸的經濟衰退，但以委內瑞拉來說，通貨膨脹並沒有嚴重地失控。相對於阿根廷、巴西與秘魯的月通膨率高達 114.5%、81.3%、63.2%來說，委內瑞拉在 1987 年整年通貨膨脹維持在 28.1%，1988 年整年維持在 29.5%。當 1988 年調查發現有 39% 的人民抱怨經濟水平的下降、同時還有 24% 的人認為經濟前景是會上升的、37% 的人認為會維持不變，可見委內瑞拉人民普遍對未來的期望則平均分佈。換句話說，大多數委內瑞拉的人民並沒有將他自己視為處在損失的情況下。

如展望理論所預期的，大多數的人民並沒有傾向於追求高風險的政治行為。結果，前總統 Carlos Andres Perez 在 1988 年底再次贏得總統大選。事實上，在這 12 年的第一次選舉中，當選人與執政者都是來自同一個政黨。當 Perez 在其競選活動中提到穩健方向的想法時，大多數的人民還是希望他可以再次如他在第一任（1974-1979 年間）帶來石油金融的成長繁榮（oil-financed boom）。因缺乏激烈的經濟問題，使得許多委內瑞拉人民還是採取風險趨避—偏好持續的政策。

可是，新總統確實面對了迫在眉梢的金融風暴。委內瑞拉的財政赤字的升高相對於 GDP 的成長，在 1988 年快速膨脹到 9.4%，通貨膨脹透過價格的控制獲得人為的抑制，使得對外貿易不均衡的嚴重性開始浮現。當政府發現國家“搖搖擺擺處於瀕臨衰退的邊緣”，執政者開始發現他們處於損失的處境之下，Perez 在 1989 年二月採取了嚴苛的穩定配套措施、刪減公共支出、提高公共部門的價格、降低對於價格與匯率的控制。透過此新自由改革的激烈計畫，他試圖要降低政府的干預，並且開放對外

貿易與投資。

就像之前案例所提到的，這些激烈的手段會帶來高度的風險。委內瑞拉的商業一向長期地受到保護，因此是否具備回應如此快速市場挑戰的能力，以及要如何成為國家發展的引擎受到高度的質疑。因此，當進口的屏障降低，危及了國內產業生存的基石，出口引導成長的期望卻仍然是個幻想。同時 Perez 的政治基礎亦受到損害，其所屬政黨 - Accion Democratica，受到內部分裂的傷害，而且為了推動此一爭議性高的計畫，使得對總統的信賴支持再度降低，造成進一步的危機。最後，調整的社會成本過度增加，加劇了老百姓不滿的聲音，增加了政治的緊張程度。Perez 及其顧問雖意識到此一風險，但並沒有選擇勇敢面對並處理之。

政府上演了激烈的計畫，放棄了漸進式的重建方案—只降低了限制金融風暴的傷害程度，卻很難快速恢復所有的損失。若人民與執政者對於國家前景的憂慮有同樣的感受，根據展望理論，這樣做法應該是會獲得高度評價的。但是對大多數的人民而言，並沒有面對如此毀滅性的過度通膨，也沒有認為他們的生活與經濟狀況面對高度困境，對於 Perez 的激進改革策略並不贊同。在總統執行其激烈政策後的數週，只有 25.6% 的委內瑞拉人民支持總統的決定，52% 的人認為此嚴格的手段是不必要的。於是委內瑞拉發生史無前例大規模的暴動，至少造成三百人死亡。此後，人民對政府的支持一直維持在非常低的狀態。對於 Perez 績效的不認同往往超過認同的情況，且對其評價在 1990 年中明顯地轉為負向。1992 年政變前，87% 的委內瑞拉人民投票對總統的不信任，且 56% 的人對其績效持非常反對的回應。

雖然疑慮與反對的程度在全國各地持續高漲，但其實委內瑞拉經濟獲得改善的速度比阿



伍、管理專題





根廷、秘魯、巴西都快很多。例如，在 1989 年的深度蕭條後，在 1991 年的 GDP 成長達到 11.4%，且失業率仍然在非常低的水準。且 Perez 政府花費比 Menem、Fujimori、Collor 多非常多的資源在緩和貧窮。雖然如此，總統並沒有贏得社會大多數的支持。就如展望理論所預測的，許多人只有在他們發現他們自己處在損失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嚴苛穩定計畫的風險以及所導致的社會成本。

這個例子說明了領導人與人民在經驗與認知上分歧的問題。Perez 認為當前經濟處於重大損失的情境下，而導致他採取大膽而粗糙的穩定手段，但是人民面對經濟的困境，並沒有因為過度通膨而受傷害。既然老百姓沒有突然被推進損失的情境下，他們就會拒絕總統的風險性與高成本的行動。展望理論在此可以用來解釋委內瑞拉新自由改革的經濟重建成功為何會造成如此戲劇性的重挫。

展望理論也可用來解釋當一個國家處於昇平狀態下，非預期的經濟政策通常得以持續。一個有趣的例子發生在智利。在智利的『新民主體制』之下，不論是領導人和人民都面對著獲利的前景，因此採取風險驅避的決策，以維持 Pinochet 將軍獨裁控制下的自由經濟市場。這個新的自由改革模型被反對民主者強烈的批判。但自從 1980 年中期，他帶領了智利在低通貨膨脹下和財政與對外貿易的均衡下，持續了一段期間的蓬勃發展，這項成果相對於其他沒有任何希望的拉丁美洲國家來說，顯得特別突出。面對獲利的前景，新的民主領導人將許多需要改變的需求束諸高閣，而進行這個已建立的發展模式。而主要的人民也都贊同此風險驅避的決策，即使這個政策是極端的獨裁控制，與世界走向自由經濟發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肆、政策認知實驗

展望理論的一個重點是，人的情緒及慾望受到決策參考點的影響。問題的表達方式不同，人們用以評估與判斷的決策參考點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決策偏好結果。同理，政黨在政策的推動宣導與選戰的文宣中，就應設法改變選民對於政治與經濟方案評估的參考基準點與偏好，進而扭轉選民的支持度與選戰。

Quattrone and Tversky (1988) 以政治議題進行實驗，發現決策參考點的改變確實會影響選民的決策。

[實驗一：不同決策參考點的影響]

問題 1

想像你是 A 國國民，正在舉行總統大選，有二位候選人 Brown 和 Green，分別提出二個不同的政策，但都可行。此政策都受到 A 國二位知名的經濟學者研究，且在其他四國 { B、C、D、E } 已經在執行了，每位經濟學者都做了預測。預測內容包括標準生活指數 (SLI)，此一指數越高表示經濟前景越好。預測結果如下：

		其他 四國	Brown's 政策	Green's 政策
經濟 學者	1	\$43,000	\$65,000	\$51,000
經濟 學者	2	\$45,000	\$43,000	\$53,000

假如你是 A 國國民，依據以上資料你要投給那位候選人？

結果：[Brown:28% ; Green:72%，(樣本=89)]

問題 2

		其他 四國	Brown's 政策	Green's 政策
經濟 學者	1	\$63,000	\$65,000	\$51,000
經濟 學者	2	\$65,000	\$43,000	\$53,000

假如你是 A 國國民，依據以上資料你要投給那位候選人？

結果：[Brown:50% ; Green:50%，(樣本=96)]

由以上問題證明對於 Brown 與 Green 的選擇會受到其他國家預測之標準生活指數 (SLI) 所影響。假設二位經濟學者被認為是公平且一樣專業的，且問卷回答者給予二位學者的預測一樣的權重，則計算得 Brown's 政策之期望價值 (\$54,000) 幾乎與 Green's 政策之期望價值 (\$52,000) 差不多。可是因為二位學者預測之差距較大，故 Brown's 政策的風險較高。因此 Brown's 政策較容易獲得風險偏好者的支持，而 Green's 政策將容易獲得風險驅避者的支持。

根據展望理論，個人對風險的態度決定於其認知為獲利或損失，也就是相對於基準點的看法。

在問題 1 和 2 中很合理的會採用其他國家的預測之標準生活指數值 (SLI) 當作基準參考點。映射到 Brown 和 Green 的政策結果，在問題 1 中被視為處於獲利一方，在問題 2 中則被視為處於損失一方，故在問題 1 會比在問題 2 中回答問題者，會較以風險驅避的態度來回答。換句話說，如果你是參選人 Brown，在發表政策時，應該提供如問題 2 般在其他四國執行效果較好的決策參考點給選民，如此可以避免使自己趨於劣勢。

相對於競爭者，在位者對選民而言通常是風險較低的，因為競爭者通常知名度不如在位者，且其政策會徹底的改變目前的現狀，不管是更好或更壞。根據展望理論，在獲利一方人們是風險趨避的、在損失方是風險偏好的，則在國家狀況良好時，支持在位者對選民而言是低風險的較佳選擇，如果選民能認知到在位者或其所屬政黨候選人會使目前的良好狀況得以延續。相對地，若選民對於當前狀況與在位者不滿時，競爭者參選相當於提供了一個值得打賭的機會，通常選民較願意接受這個賭注。在問題 2 中高風險的候選人得利於國家狀況不

佳的情況，而不是得利於其所提政策的期望價值較高。可是，很明顯地，假如競爭者的期望價值顯著地低於在位者時，即使選民是風險偏好的，競爭者也不會當選的。

[實驗二：原始狀態影響決策參考點 (Endowment effect)]

問題 3

想像有二個候選人，Frank and Carl 想選總統。在政策方面，Frank 希望維持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在目前的水準，目前通貨膨脹率為 42%、失業率為 15%。Carl 提出一個政策可以將通貨膨脹率降低 19%，但同時失業率會增加 7%。假設你是 A 國選民，你會投票給誰？

結果：[Frank:65% ; Carl:35% , 樣本=91]

問題 4

想像有二個候選人，Frank and Carl 想選總統。Carl 希望維持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在目前的水準，目前通貨膨脹率為 23%、失業率為 22%。Frank 提出一個政策會使通貨膨脹率上升 19%，但同時失業率會降低 7%。假設你是 A 國選民，你會投票給誰？

結果：[Frank:39% ; Carl:61% , 樣本=89]

問題 3 和 4 的差異僅在於原始狀態不同，在二構面風險趨避下，主要的選擇都是選接近原狀態的政策。這與標準期望效用理論裡所認為偏好不受原始狀態影響的預期不吻合。再一次說明，本質上選民自然地會以在位者的政策當作原始狀態 (參考基準點) 來比較競爭者的政策。引進風險與不確定的觀念，在風險趨避下選民將會偏好在位者，也就是當狀況良好且可接受時，選民希望維持安全，而會選擇風險較低的在位者；只有當狀況不可接受時，競爭者才能獲得優勢。

政治決策通常牽涉到取捨，對某些人民有利，但可能對某些人是不利的。贏得某一部份選民支持的同時，也可能同時失去某些選票。





因此如何增加大部分選民的敏感度，以獲取大幅支持的同時，能盡量降低可能失去選票的敏感度，可以透過不同的問題架構方式來顯現。

[實驗三：描述方式不同，決策參考點不同，影響的敏感程度不同]

問題 5

增加就業率的政策設計常常會造成通貨膨脹率的升高。假設你面對以下二個經濟政策，你要選哪一個？

	失業率	通貨膨脹率
計畫 J	10%	12%
計畫 K	5%	17%

結果：[計畫 J：36%；計畫 K：64%，樣本 126]

問題 6

	就業率	通貨膨脹率
計畫 J	90%	12%
計畫 K	95%	17%

結果：[計畫 J：54%；計畫 K：46%，樣本 133]

問題 5 和 6 問題其實是一樣的，但受試者的反應顯然違背恆常性。這是因為問題中顯示受試者對於失業率所描述的數值較就業率敏感之故。這就是心理學所稱的比例差異準則 (Ratio-difference principle)。

貨幣的效用函數也可以視為主觀對於貨幣價值的心裡尺度。比例差異準則主要在說二正向差異的量隨其比例增加而影響越大。 $\$200$ 與 $\$100$ 的差值影響因為其比例為 2，故影響較 $\$300$ 與 $\$200$ 的差值 (比例為 1.5) 影響來得大。比例差異準則會影響認知的結果。這樣數值上的尺度可以用在很多議題上，包括就業率、失業率等會因相同的差異，不同的比率產生不同的認知。例如，前面例子裡失業率由 10% 變為 5%，比率是 2；而就業率從 90% 變為 95%，但比率接近 1，故產生如上結果。比例差異準則在政治行為上有許多應用，尤其是許多政治選擇

牽涉到有限資金的配置問題。

一般會相信少數族群 (如黑人) 的犯罪率較非少數族群 (如白人) 來得高出許多。實際上，根據 FBI 真實的犯罪統計，1982 年，黑人犯罪率是 2.76%，美國白人的犯罪率是 0.68%，差異非常大，但若以遵守法律的比例來看，黑人守法比率為 97.24%，白人為 99.32%，差異不大。但在顯示犯罪率被認知的方式會依據資料被架構的方式所影響。此問題亦顯示人們對於黑人與白人所形成的看法，多依據犯罪率，而非遵守法律的比率來建構的。

當被問及一億美金的犯罪防制經費，如果以犯罪率來問時，認為應配置於黑人社區的平均金額為五千八百四十萬美金，如果以遵守法律的比率來問時，認為應配置於黑人社區的平均金額為四千七百二十萬美金。再一次顯示資料被架構的方式會影響政治決策的結果。

肆、總結

展望理論提供我們一個從人的認知出發，思考政治議題與選舉策略的方向。不論是當前執政者或者參與競爭的反對黨，都必須深入瞭解國家發展前景與人民心中的看法，才能使得政策與政見切中人心，獲得國人的支持。而國家前景與人民心中，看法牽涉到決策參考點與認知與偏好，因此議題與政策的推動，必須同時考慮相對於決策點的差異，所形成的偏好態度差異與敏感度不同，才能使議題或政策的規劃發揮最大的效果。

同理，選票決定國家發展的未來，也就決定人民的未來幸福，因此身為這片土地的每一份子，不論在看待執政者的政策推動或者反對黨的意見批評與選舉政見，都必須稟持理性思考，不要無時不刻被議題政見或政策表象左右偏好，才能發揮你手中選票的關鍵效果，爭取

國家前途與自己的福祉！

伍、參考文獻

洪茂蔚，劉玉珍，2003，展望理論的啓示，中國時報，2003.3.9.

De Bondt, Werber F.M and Anil K., Makhija, 1988, "Throwing Good Money After Bad? Nuclear Power Plant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the Relevance of Sunk Cos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 173~199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291.

Kepke, Matthew Aaron, 1997, "Iraqi Sanctions – Rational Choice,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472.

Parekh, Anand, 1995, "Deterrence and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U.S.-North Korea Rel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472.

Patty, John W., 2002, "Loss Aversion, Presidential Responsibility, and Midterm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Working pap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Quattrone, George A., and Amos Tversky, 1988,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Politic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3), 719-736.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1973.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2): 207-32.

Weyland Kurt, 1996, "Risk Taking in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esson from Prospect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 185-208. ♥

(本文作者：

洪茂蔚現職為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劉玉珍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系教授

戴維芯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財管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安格爾作品「荷馬頌」創作於 1827 年，作品中把荷馬和希臘最莊嚴的神廟聯繫在一起，領導者受到勝利女神桂冠加封及民衆的擁戴和崇拜。王子建臨摹於 1998 年。



伍、
管理
專題

